

三、疫情對中國大陸社會面影響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博士後研究員王占璽主稿

- 疫情造成的全面經濟社會衝擊，直接影響人民維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並提高醫療公衛風險，也使各類弱勢群體的生存處境更為惡化。
- 社會對中共作為的不滿情緒高漲，若既有社會保障體系及針對疫情救濟措施無法有效緩解社會需求，社會批評輿論將持續升高，但社會抗爭仍將以傳統的維權模式為主。

（一）前言

中國大陸疫情的肆虐，不僅嚴重威脅其民眾的生命健康，也對經濟發展與社會運作產生全面衝擊，其影響程度已經超過 2003 年的 SARS。疫情的擴散及對應的管制工作將結合既有經濟社會問題，導致多種類型的社會衝擊，並使各類弱勢群體的處境更加艱難，也直接影響社會的整體發展與穩定。然而，2020 年是中共宣稱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收官之年，中共當局為維持政治穩定與完成經濟社會發展承諾，不但低估疫情真實擴散情況，亦可能掩蓋各類社會影響。

（二）不同類型的社會衝擊

1. 經濟發展停滯衝擊人民基本生活

對中國大陸各地民眾而言，疫情最直接而全面的衝擊是經濟發展停滯對個體與家戶經濟生活的影響。疫情爆發之後，經濟生產活動因各省市不同程度的封城、停工作為影響而大幅下降。中國大陸 1 至 2 月經濟發展數據中，工業生產、零售銷售和固定資產投資等「三駕馬車」均呈現出大幅萎縮趨勢。同時，數以百萬計的中小型企業因瀕臨破產邊緣而大量停工、裁員，導致官方失業率暴增至史上最高的 6.2%。而多數中產階層聚積家戶財富甚或負債投入的房產市場已經呈現斷崖式的下跌，一、二、三線城市

的總成交量同比下降幅度均超過 70%，並導致超過百家房地產廠商申請倒閉。此外，1 至 2 月食品價格上漲幅度超過 20%，帶動消費者物價指數連續兩個月上漲超過 5%，也將限制民眾維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

即便中共當局強制要求復工復產，但 3 月初外商研究機構的調查指出仍有 3 成企業仍未復工。特別是中小微型企業復工進度緩慢，並存在「復工難復產」、「復產難達產」等問題。此外，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導致各主要國家經濟停滯及進口需求降低，勢將拖遲中國大陸經濟的復甦速度，進而延長一般人民生活受到衝擊的時間與程度。

2. 醫療服務供給下滑、其他公衛風險提高

另一項直接但隱性的衝擊，是在中國大陸醫療衛生體系全面投入疫情防治工作的同時，導致正常醫療與疾控體系的能量受到排擠，進而提高其他健康風險發生的可能性。一方面，一般醫療機構的服務供給能量因投入防疫工作而下降，加深既有「看病難」的問題，特別是使各類慢性病、急重症民眾無法得到穩定的照顧。如湖北天門市出現癌末病患「被出院」、待產孕婦無法產檢等現象。另一方面，公衛防疫系統的超載則將影響其他傳染病與健康風險的預防能力。如在 2019 年底內蒙與北京陸續出現的鼠疫傳播，在疫情資訊掩蓋下已然消失在公眾關注視野，但若鼠疫因防治不足而失控擴散，勢將導致另一波公共衛生危機。

而更重要的仍是疫情是否已經受控。中共當局為維持經濟表現已強制各地復工、解封，並刻意透過確診統計口徑的調整來壓低疫情數據（如無症狀感染者不列入確診名單）。由此導致疫情實際擴散情況被嚴重低估，而官方為維持疫情受控假象而中斷防治工作，則更易導致疫情出現難以預期的再次爆發。

3. 社會保障能力下滑、弱勢群體生存處境惡化

因疫情導致社會運作的停滯，也將使各類弱勢群體的生存處境更為惡化。例如生活自理能力不足的老年群體在缺乏醫療照護服務時，將更容易出現健康風險；本就缺乏足夠就業保障的城市

農民工，將因企業欠薪或倒閉而陷入困頓；徘徊在貧困線邊緣的大量底層中產群體，則易於因經濟停滯而「返貧」。這些不同弱勢群體的需求將提高社會保障體系的負擔，但經濟下滑也將限制地方政府對於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的支付能力。對此，中共當局目前提出多項加強就業保障與失業救濟政策（如「關於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強化穩就業舉措的實施意見」），以落實三保目標（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能力），並提高地方財政留用比例，新增留用 1,100 億元人民幣供縣級政府使用。然而，近年來基層政府推動扶貧工作時，普遍存在且禁之不決的資金貪腐與執行不力現象，以此觀之，針對疫情的救濟政策是否能充分落實並保證各項社保制度穩定運作，仍難有樂觀期待。

（三）國家社會關係的變化

疫情爆發後，中國大陸社會不滿之輿論聲浪便持續湧現。從 2 月首位「吹哨人」李文亮逝世、近期另一位吹哨者艾芬受訪報導遭刪文，到中央與地方宣傳部門各種強調正能量、歌功頌德的宣傳，都引起網路輿論的持續抨擊。如中宣部指導發行的「大國戰疫」一書，被批評為過於阿諛的「低級紅」而緊急下架。中共當局在應對疫情時的各種治理失靈及負面作為，已使中國大陸民眾普遍產生對國家治理能力的信任危機。而對於疫情造成的經濟社會衝擊，中共當局採取的各項救濟政策若因執行不力或貪腐而無法有效實踐，將持續引發社會輿論批判。

網路輿論固然呈現出社會不滿情緒高漲，但中共當局持續加強宣傳引導、輿論控制及社會監控，且近 10 年來公民社會的議題倡議及組織動員能量已遭大幅削弱，使疫情防控本身較難成為凝聚社會抗議行動的新議題。然而，因疫情產生的經濟社會衝擊，仍將導致相關利益受損群體的維權抗爭行動更為頻繁的出現。就此，「後疫情時期」中國大陸的社會不穩定程度將有所提升，但表現型態仍將以區域性、小規模、物質訴求的傳統維權模式為主。

(四) 結語

中共當局在應對疫情時，仍高度仰賴威權專制體制的強制性作為。而社會不穩定程度的提升，則將促使中共更加強化社會監控的範圍與力度，以在 2022 年中共二十大前確保習近平的統治權威不受外部挑戰。然而，中國大陸社會是否能夠持續忍受威權政府的治理失靈與不斷增強的社會控制，將是中長期評估中國大陸社會穩定的重要觀察焦點。